

高等教育之社会分层功能分析

张继明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的功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大,从理论上讲,是增加了促进社会分层趋向均衡的可能性。但现实中由于弱势群体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优质教育资源和就业上处于劣势,高等教育反而成为维持和复制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工具。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变迁;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8742(2012)01-0027-06

高等教育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是复杂的,从理想的角度而言,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功能。然而很多时候高等教育却阻碍着人们向更高层级递进。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分析,高等教育担当了社会优势阶层排斥弱者而巩固既得权力与利益的工具^[1]。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社会各阶层来说意味着什么?入学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流动的增长和分层的优化吗?

一、高等教育之于社会分层的双面效应

从中世纪开始,高等教育就承载了社会大众藉由大学实现身份解放的理想,无数人从中获益。但高等教育并非完全以知识与智力为标准将任何潜在的精英纳入大学,其阶层排斥性令许多下层子女无缘于大学和社会上层。

(一)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分层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指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布劳和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也认为,个人的教育程度是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自致性因素^[2]。也即,具有一定受教育经历者更易于实现层级递进。相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更显著,因为高校毕业生将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而高等教育文凭被视为受教育者拥有较高知识和能力的象征,

作者简介:张继明(1979-),男,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管理。

是就业市场准入资格的标志。事实上,虽然有关高等教育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始于近代,但大学史研究表明,早在12世纪,大学教育就已对学生的职业变迁产生实际影响。在当时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正是凭借大学文凭或证书取得法律专门职业的从业资格^{[3]4}。在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教育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社会分层与流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潘光旦等通过分析康熙至宣统年间915份中榜的贡士、举人和进士的朱墨卷谱系,对研究对象的先辈的功名情况进行统计,发现五代内无功名者的比例为13.77%^[4]。这表明该时期科举考试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由于新型的生产劳动和产业结构对科学越来越形成依赖,高等教育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具有接受大学教育经历的人开始作为知识与技术精英步入社会上层。尽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文凭已经不足以作为直接踏入精英阶层的凭证,但中间阶层的扩大也亦证明高等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积极性^[5]。可以预见,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贡献将呈现加大的趋势。

(二) 高等教育阻碍社会分层

在现实社会中,高等教育并不仅仅作为社会底层通往上层的“电梯”,很多时候它反而阻碍社会流动。国外学者对17世纪三四十年代牛津大学生源构成的研究显示,平民出身的学生在入学人数中所占比例远低于强势、专业阶层子女^{[3]154}。大学的这种阶层排他性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大学学生构成后发现,各类高校中来自蓝领阶层的学生所占比例远低于白领阶层学生。不同阶层的学生在学校选择和专业分布上也存在着一致性的差异^{[3]235}。到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消极作用依然明显。据统计,2002年来自全国20%的最富有家庭的大学生比来自20%最贫穷家庭者多30%,而这与1980年的情况基本一致^[6]。也即,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取决于学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通过高等教育能实现社会流动的增长。在我国,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往往是制度性因素。如上世纪末出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由于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效应,得到贷款的往往是有一定还贷能力、能够调动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的学生,而非亟需资助的贫困生^[7]。再如,在成本分担机制下,高校收费已影响到教育和社会公平。还如,重点大学的招生本地化和城市化倾向,损害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生源的利益。不同阶层子女在大学中的比例差距表明,高等教育更加青睐优势阶层子女,教育因素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权力和经济要素共同决定弱勢阶层子女在职业变迁以及社会流动中居于劣势。

二、我国强弱阶层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中的分野

在影响阶层分化和流动的因素中,政治与经济资本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教育因素常受制于此。这从我国教育因素对社会分层影响力的历史演变中即可窥见一斑。也正因如此,即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弱勢阶层在通往上层的道路上仍

举步维艰。

(一) 我国教育因素对社会分层影响力的历史演变

在科举时代,科举制度使千万平民士子成为各路精英。但统计表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者有67%的人其父为官,83%三代内祖先居官^[8]。这表明,大多科举入仕者有权力荫庇。教育与权力的结合作为社会分层的原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正确是确定通向社会上层的首要条件,政治权力宰制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命运。虽然高等教育造就了一批技术精英,但他们实质上是依附于政治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积极追求个人财富的“脑体倒挂”的年代,教育与科研部门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低于生产和流通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学生辍学率提高,“读书无用论”抬头,教育对社会层次结构的影响是式微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转型期。随着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率获得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通过影响个体职业选择,高等教育成就了一批知识和技术精英,学历主义和文凭主义在那个时代的盛行,很好地诠释了当时高等教育对于促进职业变迁和阶层递进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开始发挥基础作用,掌握市场话语权的经理和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迅速上升到社会顶层。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将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轴,知识和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将更加突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通过上大学实现阶层递进的可能性。

然而,社会流动意味着利益的分享和竞争。在各阶层间的利益博弈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治精英和掌握经济话语权的市场精英,凭借权力和金钱的力量继续保有既有地位和利益,并竭力获得更多。而且,两种资本基于共同利益的结合促使“权贵经济”的产生。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发生不可避免的弱化,对于最广泛的社会大众来说,通过教育实现阶层递进的理想变成海市蜃楼。

(二) 我国弱势阶层通往社会上层的艰难之旅

在我国,权力资本以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形式主导着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始终是社会分层的最大影响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权力资本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导致两种资本的结合进一步限制了社会分层的优化。而且,在独特的语境下,我国权力网络的极其庞大和经济资本者超乎寻常的社会话语权,使得两者的结合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被赋予首位考量。所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在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享受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又会反过来影响到社会阶层结构,而这种影响常常就是复制和延续。

研究表明^①,现阶段我国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的子女不仅在总体上享有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而且享有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重点院校及热门专业的广泛受益者。而农民、工人及城乡无业、失业者等弱势阶层子女更多选择师范、农林类院校及普通文理或基础理论领域的冷门专业^[9]。在教育面前,家庭背景如经济状况、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资源调配能力等都影响着学生选择的向度,其中经济背景的影响尤为显著,学费已成为影响不同阶层子女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10]。甚至十年来飙升的高等教育收费已经影响到社会公平。当然,权力的涉入同样令普通人深感无助。强势家庭的权力及其它社会资源已经成为教育和就业市场上弱势家庭子女的梦魇。不同的教育选择导致不同的教育结果。调查显示,以就业和升学率为教育结果的衡量指标,社会强势阶层如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这两项指标要比农民子女分别高14%和10%。而且,前者的初次就业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要普遍优于后者。相应地,其平均起薪更高。例如父辈为农民的毕业生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或经理人员者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11]。

在以职业和收入为重要分层维度的社会里,社会强势阶层子女凭借优质高等教育的经历、更突出的就业能力和背景因素而从事待遇更好、前途更广的行业或职业,从而延续了父辈的阶层优势。相反,那些弱势阶层子女则延续着阶层的弱势。在此,高等教育犹如一堵墙,将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分隔于两侧,部分弱者将攀爬到墙的另一侧实现身份的转化,而对于另一部分弱者来说这堵墙则难以跨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强弱阶层的分野在延续着。

三、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阶层固化的推手

关于“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的言说并不仅仅是网络流行语,也是对现实社会的生动写照:富成了富的原因,贫穷则继续制造着贫穷。权力所谋取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源及各种资源本身,都在通过教育等各种形式实现着传承。而期望通过上大学获得解放的弱势阶层子女则总是跨不过高等教育这堵墙。

高等教育与“墙”的类比表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阶层代际传递的中介,使得家庭的社会层级通过影响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而完成其下一代的阶层复制。这个代际间的流动,“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12]。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无形中扮演了一个社会强势阶层表达其权力和经济资本诉求的工具性角色。当今社会,“二代”现象凸显阶层的差异

①“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差异研究”显示,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4倍;民办高校与公立高职的辈出率之比达到22倍以上。在专业选择上,以热门的会计专业为例,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66.4%,而下层社会子女仅为36.4%;在较冷门的行政管理的选择上,前者条件概率仅为13.1%,后者则达到42%,表明下层子女更多选择冷门专业,上层子女则正相反。详见:谢作栩.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教育学报,2006(4):66-74.

和不公。但实际上这种代际的资本传承是始终存在的,只是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将这种资源的垄断或排斥“合理化”了,以至于大多数时候我们难以觉察到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不公平的存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高等教育的结构及其成员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受到不断强化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官僚政体的影响的,统治阶层通过知识、学历和文凭来巩固既得地位,排斥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侵占,这种排斥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继承”来实现的。在此,文化资本即高等教育的经历和文凭,这种资本的继承是通过合法的制度安排来完成的。“罗彩霞门”的冒名顶替案、一系列有倾向的高考加分政策,正是强者利用资本、借助教育工具抢占利益并排斥弱者的实例。再如,大学生就业难是摆在弱势家庭面前的一个真命题,但对于具有广泛的权力与经济资本的家庭来说,这只能是假命题。此时,社会或教育的筛选标准已经不是知识与能力。由于在高等教育竞争中社会弱势阶层的子女总是处于劣势,低就业低薪酬的困境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教育这条理想中的解放之路。当他们认识到投资高等教育越来越难以得到预期回报,以及高额的大学收费反而使很多家庭致贫时,“新读书无用论”产生和大规模弃考发生了。弃考是无资本者在与资本者的竞争中的理性退出,只是理性中更透着无奈。

回顾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不依赖于“精英结盟”的主导,而改革和发展的利益也总是优先于社会上层集团。我国贫富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种倾斜式与集中式的分配模式。虽然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存在的,如今社会十大阶层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这一点。但阶层的继承性更不容否认,“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的现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13]。在这个阶层复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成了优势阶层利用的工具,他们动用各类经济与社会资本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据为己有,而使得下层大学生从入学到就业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居于劣势。文化资本、个体先赋特征和大学的阶层排他性,使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就贴上了“穷人”和“富人”的标记。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但现实中,教育不公平正成为我国阶层以及城乡贫富分化的推手,这种社会等级制度乃至个体的命运是由“国家借着教育制度隐蔽地制造和维持”的^{[3]280}。

批判理论认为,学校教育是推行国家意志、维护社会强势阶层既得权益的工具,这决定了高等教育促进阶层平等的“解放意识”最终走向破产^[14]。该理论在批判地分析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的基础之上,寻求为构建教育的解放性价值体系开出了处方。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批判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何构建以公平和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还原高等教育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的解放价值指向,改变其屈从于政治与经济及世俗欲望的工具性角色。当然,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于强大的惰性,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学以及大学人应该担履其“为天下先”的精神,推动以政府担纲为主的制度变革。也即,对于大学来讲,应思量如何保持其独立与超越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摆脱政治与经济等多重干预,关注弱势群体,为之提供更多的机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者和研究者来

说,须坚定大众立场,强化社会责任,做教育和社会的良心,而非作为少数人的利益代言者和不公平制度的卫道者。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5.
- [2] 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7.
- [3] 张斌贤.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4]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08.
- [5]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21-25.
- [6] [美]大卫·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2.
- [7] 侯定凯.高等教育社会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 [8] 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41-148.
- [9] 谢作栩.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J].教育学报,2006(4):66-74.
- [10] 武毅英.高校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 [11] 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58-63.
- [12]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47.
- [13] 白天亮,曲哲涵.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N].人民日报,2010-09-16(13).
- [14] [英]雷吉斯·吉普森.批判理论与教育[M].吴明根,译.台北:师大书苑股份有限公司,1989:56-57.

(上接第 14 页)

- [4] [美]布坎南.自由的界限——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M].顾肃,译.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16.
- [5]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53.
- [6]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C]//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371.
- [7] 马廷奇.制度创新:我国大学实现转型之路[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6):8-11.
- [8] 沈岍.高校如何走出法治的真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维度[C]//行政法论丛.第五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

(收稿日期:2011-09-11;编辑:何 风)

ranking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be dealt with.

Key words: universities ranking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university system

Higher Education's Func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Zhang Jiming

Page 27

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has the function of advancing social mobility and optimizin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stage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expanding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oretically improves the possibility of balancin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wever, in reality, higher education becomes the tool of maintaining and duplicating the unfair social structure in that the students form vulnerable classes are in the inferior status in gett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good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equity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Yu Xiulan

Page 33

Abstract: A person'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can offer him (her) such supports as emotional aid, financial aid, companionship and inform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by name-generator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ose of other students. For example, the size of financial aid network and the siz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re smaller than those of emotional aid network and companionship network. Current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are the main parts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However, comparing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other students, the densit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is smaller while their heterogeneity is greater. There are more rural members in rural students' networks and more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members in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networks. As a result,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can give less supports than other students' networks. More teach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offer supports for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Key words: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network support; social survey

Path to Develop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Qiu

Page 43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British path and American path of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former establishe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the latter carries out vocation-oriented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Then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developing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British vocational education; American vocational education